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启文 白卫星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佳贵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园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文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中国经济的“中西医结合疗法”

需求管理相当于西医,供给管理相当于中医。中国经济政策应该采用“中西医结合,中医为主,西医配合”的综合疗法,为长期可持续较快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

2010 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上,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时说,研究中国汇率问题有“中医”和“西医”之分。从更广泛的视角上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也有“中医”和“西医”之分——“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但有比喻的好处是更为形象化和有助于加深理解。

首先,我们看一看在医学上两者的区别。著名老中医任应秋先生曾经对“病”的概念作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任应秋老先生这段精辟的论述:“西医所称的病,大多数是取决于病原体,或者就某种特殊病变的病灶而命名,或者就生理上的某种特殊变化而命名。总之,西医的病名,必取决于物理诊断和实验诊断,是比较具体的。”“中医的病,或与病因的性质而命名,或与突出的症状而命名,或从病机的所在而命名,虽然比较抽象,但它却往往能从整体观出发,局限性比较少。”

其次, 西医治病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所以可认为某一味药有效,而且服后很快见效。但反复用,会产生抗药性,使正常剂量的药物不能再发挥应有的效果,甚至使药物完全无效。而中医对一个人有机系统,水、空气、食物等要素供给到一个复杂生命系统中,欲望、情绪、环境等参数调节系统的运行,影响合成与排泄,从而影响系统健康。中医开出一副药里,往往有五味、十几味药,是一种稍慢的疗法。中医可能不像西医那样有很完整的实证分析,主要依靠应用检验,同时有些方面要凭借长期、广泛的经验。如果在应用经济学领域,以中医式的长期、广泛的经验而言,其积累既要建立在统计的基础上,也要凭借对经济运行的体会与全局性综合,在某些方面有可能做得不一定非常准确,但却具有系统性的优点与好处。

我们认为,需求管理可以比喻成“西医”,而新供给所强调的供给管理更像是“中医”。“西医”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且每一个具体组成部分都有单项论证,但西医副作用也大,主要是经济自身的抗药性逐渐增强。著名的“卢卡斯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耐药性的表现。除了上世纪促使凯恩斯主义“破产”的“滞胀”困局之外,近期一个经典的例子是,2007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危险,其中最大的威胁便是有效需求不足,这基本符合凯恩斯经济学对短期经济增长困境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几乎都同时实施了西医疗法,即经济刺激计划,一方面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推出了程度不等的刺激性投资;另一方面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量化宽松。但西医疗法的副作用已经表现出来了,就是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债务悬崖,货币政策退出也不容易,可能产生突然间的“流动性干枯”和债券价格下降。如果以后再出现的经济衰退,西医治疗的空间已经很小了。

对于宏观经济决策而言,短期和中长期的政策目标和主要任务不尽相同。“西医”的指向主要在于力求熨平短期经济波动,逆周期调节,重点在于解决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抑制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等;“中医”主要是防微杜渐,“不治已病治未病”,培育有效供给,着重解决与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缺失相联系的结构问题与制度性的问题。

然而,在现实政策操作中,“西医”和“中医”常常出现冲突,集中表现就是:在长期视角内,短期需求过度用西医式刺激可能造成债务增加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要素跨时错配,投资过度,从而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过度强调中医式调控,可能会遭遇到短期有效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



●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



●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

需求不足的困境,甚至陷入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险境,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频繁,进而损害经济在长期增长过程中的平衡和稳定。对一个具体的经济体,需要两方匹配、有所侧重地对症下药。

实践中,政策决策者容易过分使用西医,对西医越抗药越加大药剂量,产生“西医依赖症”。因为当经济突然下行时,往往产生“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容易马上使用西医,因为疗效快,成为社会上“流行性智慧”,而且在政策上容易产生共识。与之相反,坚持中医疗法不容易。深层次问题都是不容易察觉的,是个“温水煮青蛙”过程。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长或者其他根本性经济因素的长期变动所引起的,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具有渐进性,所以容易被同时代的人忽略”。特别是,深层次问题,在治疗上不容易产生政策共识,与

社会上“流行性智慧”可能背离,难以得到公众支持,大都可能导致久拖不动,即使能正式议论起来,也往往议而不决,不了了之。

未来十年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非常宝贵、非常关键的时期。今后这十年中,乃至中长期,中国经济该用西医还是中医呢?如果说要中西医结合,其中的结合是以谁为主、或怎样有机地结合呢?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经济到底长期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最重大挑战是需求不足(或需求管理)问题,还是供给不足(或供给管理)问题,对策思路中如何把握“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关系?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我们认为,既不能不顾短期经济平稳增长的需要而忽视需求管理,也不能轻看和忽略供给管理,特别是经济社会转轨中制度供给问题。有效需求为什么释放不出?那是相关的有效供给没跟上。妨碍产业增长的制度不改革,潜能如何释放?在中国现阶段,有效需求主要靠有效供给激发,特别是以制度供给的有效性激发活力、创造力而提升产品、服务层面的有效供给去呼应和提升有效需求。

中国“十八大”后的新阶段上,更要放眼于长期供给,因为长期供给才是决定中国潜在增长轨迹的关键,特别是在中国对冲潜在增长率下行因素、激发其上行因素而追求长期健康较快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之后,增速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逐步收敛。这是国际发展经验的铁律,不是靠盲目乐观就可以改变的,必须居安思危,及早应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两位数降到一位数,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长期经济增长水平降得过低,就会导致出现类似日本的“失落的二十年”。因此,我国经济政策要更多以长期经济发展为重点,以改革为核心,努力做到中西医结合,“中医为主、西医配合”。

中药通常是一副药里好几味药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配合起来达到总的疗效。我们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在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由此引出的被称为新供给经济学探索中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所谓“八双”。“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在现在的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应该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双到位”——在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推进金融改革与创新的配套改革。这些举措都类似中药,是至少好几味药的协调匹配,因为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各项改革需要协同配合中推进。

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往往会拒绝“吃中药”,经济不好的时候“吃中药”余地又不大,容易选择“吃西药”,而且给中国经济“吃中药”的时间比“吃西药”的时间长,疗效也不容易立竿见影,会不习惯和缺乏耐心,遇到挫折,容易放弃。这需要决策者的坚毅和社会广泛支持,把中医也吸纳成“流行性智慧”,成为全社会共识。日本本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济依然较高速度增长时及早采取中医疗法,大胆改革,才能有望避免 1991 年后的经济停滞。1991 年后,日本采用多次西医疗法,反复财政刺激,结果债务越来越高。即使使用“安倍经济学”的新西医疗法,没有中医的配套式诊治,怕也是积重难返。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课题组成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等】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今年上半年的 7.6%经济增长,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主要放在对现有增长速度的基本认可和速度继续下行的担心上,潜意识处还是希望有较高的增长速度。我以为,这些都还是一些表面化的认识。核心的问题是要明确中国经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增长?必须搞清楚影响和决定经济增长的本原性问题,然后才能据此科学评估时下的增长,以及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矛盾。

■ 葛守昆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为什么要经济增长?

经济自消费始。人类最初的经济活动主要从消费开始,人类最初和最终的经济目的也源于消费。可是非常遗憾,这样一个几乎属于常识性但有决定性的问题并未被人们所重视,尤其是在经济学家中,消费对于经济的目的性在许多场合被遗忘或淡化。其实,在古代时期,人类祖先就是为了温饱的满足才脱离动物界,用劳动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来解决温饱不足的问题,从而有了最初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和再生产消费品的环节不断延伸,消费品的生产既包括消费品本身的生产,还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甚至社会的许多活动都与人们的消费产生密切的关系,以至于人类经济活动脱离消费渐行渐远,许多经济活动似乎与消费关系不是十分密切,甚至出现偏离、背离消费的情形。但是必须明确,任何生产资料的生产都不能完全脱离消费品的生产,否则,人类发展经济的目的性就值得怀疑。

以生产消费品为目的的经济为什么要增长?在根本上,则是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也是增长的,撇开人口增长的因素,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消费品的数量特别是质量需求是不断增加的,包括消费品的升级换代和消费品范围的扩展。所以,消费是经济永恒的增长动力。当然,消费品的生产要涉及到众多的生产与再生产环节,围绕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需要有生产消费品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生产消费品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还有其他为人类消费提供生产的环节,比如,安全的生产、环境的生产等。换言之,围绕消费品的生产需要一系列的社会劳动,都是表现为经济的活动。但是必须指出,只有以消费为中心构成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那些脱离、远离、偏离、

背离消费,游离于消费之外的经济增长,不能构成真正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为生产而生产、为投资而投资、为速度而速度的增长。这样的增长是一种典型的物质浪费。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客观上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如果不能形成生产能力或有产出却没有市场需求,抑或有市场需求可是投资难以收回,这种增长很难讲是真正的增长。有些国家在经济政策选择上,往往将增加就业作为首位的重要政策。比如,奥巴马在竞选美国总统时,非常重视失业率的降低。而我认为,就业作为劳动的存在形式,劳动力的使用,必须与人类消费品的生产相联系,如果脱离消费品的生产,为了经济增长速度而就业,就会偏离经济增长正常的轨道,出现为就业而就业的情况,这也是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总是有不平衡的情况,会有一些缺口,但这是劳动力市场的调节阀和蓄水池。我认为,一个国家除了保持较高的就业率外,很重要的,就是增强对部分失业率的承受能力,包括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为了经济增长速度而增加就业、减少失业,可能脱离经济发展的消费目的,也未必有利于真正的经济增长。

还需要指出,站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上,会对经济增长的目的有多样的看法。就某个人而言,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除了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以外,还有超出消费的许多目的,很重要的,是财富的积累,对金钱的贪婪,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交往、名誉、良心等;就企业来说,则是利润的最大化,利润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击败众多的竞争对手等;在国家层面上,结合开放的国际环境分析,不仅包含满足本国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还包括更多的外汇、更多的超出消费范围的财富、超越别国的竞争力等。但是站在世界层面上,如果将世界看作是地球村,是浓缩了的个人,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没有那么复杂多样,就是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增长。那些脱离消费、甚至挤压消费的增长则具有明显的非经济性,是对经济的负效应。这也清楚地表明,经济学家在个人、企业、国家还是全球层面上研究经济,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和结论。

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站在国家角度上,中国如何解决经济增长的目的,实现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我认为有两点必须考虑:一是尽可能满足居民对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这是居于经济发展首位的目的;二是争取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保持对外贸易的总体平衡、略有结余。满足这两个目的,就算是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问题是由于一些增长条件的约束,实现理想的增长并非易事。具体必须考虑到以下一些因素:

(下转 03 版)

忆于光远老先生二三事

■ 白卫星

得悉于光远先生仙逝,虽然于老已有享年 98 岁之高龄,又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使然,但总是令我这晚辈哀伤不已,思绪万千。

我与于老接触不多,但给我印象深刻。

1992 年,中共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当时主持《市场经济研究》杂志的创刊筹备工作,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一时间给予批复:是我国第一份以研究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学术刊物。我知道,于老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在经济学界享有崇高威望,而办好《市场经济研究》杂志,需要一大批经济学家给予学术支持。于是,我冒昧给于老、高尚全、吴敬琏等一批经济学家致函,邀请他们担任学术顾问。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于老很快同意担任学术顾问并寄来一篇文稿供刊载。

1993 年 5 月,我作为《市场经济研

究》杂志的副主编,专程到京邀请于老参加 8 月在银川市举办的“市场经济与西部经济发展学术联谊周”。那天,我走进于老的家,恰好朱厚泽同志也在,我于是说明来意,邀请于老参加学术活动并请他老人家莅临指导。后来,“学术联谊周”如期举办,戴园晨、何伟、晓亮、陈栋生等经济学家参加了。于老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参加,但专门给“学术联谊周”捎来一封贺信和《历史上和当前中国的私有和公有》一文。晓亮先生代为宣读了于老的贺信。于老的严谨态度和作风,对学术活动不遗余力的正能量支持,给我们以极大的工作动力和精神鼓舞。

2010 年 3 月,我与管益忻先生创办《经济学家周报》,请于老作顾问,虽然于老因年事已高没有应允,但他请胡冀燕同志打电话表达了他对报纸的希望与祝愿。

记得于老在 2005 年“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说过,“我追求!我坚持!我执着!我成功!”于老的学术追求和精神品格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

本报将举办“2013 中国经济学人”评选活动

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报拟举办“2013·中国经济学人”评选活动。参评者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其理论具有原创性、实战性、时效性、前瞻性

和首发性;在本报至少发表过一论文;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欢迎具备条件者踊跃参评。新送参评(参考)作品请发至本报投稿邮箱,来稿请注明“参评参考作品”。邮

寄作品请寄至: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46 号东区一号楼 113 室,邮编 100081。参评稿收稿截止日期(以发送日期和邮戳日期为准):2013 年 12 月 31 日。